

不是「陽謀」是甚麼？

• 丁 抒

一 兩種有待商榷的觀點

在國內，有關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的討論，基本有兩種觀點：

一、認為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是為了保持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，他想跳出黃炎培1945年提到執政黨興而覆亡的「周期率」。有論者指出：「甚至在他晚年錯誤地發動『文化大革命』，也包含着這樣的良好的願望。希望通過這樣的自下而上的『大革命』，重新鍛造黨，使它從根本上擺脫周期率的支配。」^①可惜的是，「一個正確的命題，最終卻帶來了一個不幸的結果」^②。

二、反右的不幸結果是由鳴放者的過激言論和別有用心所造成的。「五月及六月上旬的座談會也存在着兩方面的嚴重問題，一是一些黨外人士，其中包括一些別有用心的人，片面地強調批評共產黨所犯的錯誤，一時在一些場合造成了只能提錯誤缺點、不能談成績和反批評的不正常局面；二是五月中旬以後，中央原定的整風方針開始動搖，逐漸地轉向了反右方針，此後的座談會已經背離了最初的旨意，成為引蛇出洞的一個重要手段」^③。

其實，以上兩種看法只是從不同角度詮釋了中共中央在1981年發布的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。該決議對反右運動所作的結論是：「在整風過程中，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『大鳴大放』，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，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，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。」^④

本文對上述兩種觀點提出異議，並證諸史料，指出反右運動不過是毛澤東醞釀已久的一場「陽謀」。

有關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的討論，基本有兩種觀點：一、認為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是為了保持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，他想跳出黃炎培1945年提到執政黨興而覆亡的「周期率」。二、反右的不幸結果是由鳴放者的過激言論和別有用心所造成的。但這兩種看法都有待商榷。

二 從「雙百」到「鳴放」

1956年4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，陳伯達提出「百花齊放」、「百家爭鳴」，一個在藝術上，一個在科學上。同日，毛澤東總結會議時說：

1957年初開始，在毛澤東的引導下，共產黨的「開門整風」變成了「大鳴大放」，以致形成了人民對共產黨「鳴鼓而攻之」、「大放厥詞」的「鳴放」局面。



「文藝上百花齊放，科學上百家爭鳴，應作為我們的方針。」^⑤（後來簡稱為「雙百」方針。）然而1957年5月初至6月初遍及全國的「鳴放」，卻與文藝學術毫不相干，這是因為從1957年初開始，毛澤東將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引向了政治領域。自此，「百家爭鳴」的「鳴」演變成「不平則鳴」的「鳴」，「百花齊放」的「放」換成了「放言」論政的「放」。毛澤東在1957年3月6日對9省宣傳、文教部長說：「有選舉權的，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。……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，現在不是放多了，是少了，應該再放。」^⑥「不讓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，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、簡單化、不講理；……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，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，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，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，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。」^⑦很顯然，這裏說的「言論」是政治言論。

1957年3月間，黨外人士、《文匯報》總編輯徐鑄成試探地問毛：「我體會『雙百』方針的提出，在政治思想上說，是要求高價的批評，讓人民暢所欲言……」，毛直截了當地回答：「你的意見很對、很好。」^⑧

那時，毛只要提及「雙百」，指的必定是與文藝、學術毫不相干而只涉政治的「鳴放」。此外，這種「鳴放」是單向的，即僅限於黨外人士對中共「鳴放」，而中共不對民主黨派「鳴放」。在毛澤東的引導下，共產黨的「開門整風」變成了「大鳴大放」，以致形成了人民對共產黨「鳴鼓而攻之」、「大放厥詞」的「鳴放」局面。

可是，毛澤東在半年後卻完全不認帳了，反而說：「鳴放是我們發明的。……我們去年5月在這裏講百花齊放……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，學術上是百家爭鳴，就不涉及政治。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，就是甚麼問題都叫鳴放，叫作鳴放時期，而且要搞大鳴大放……」^⑨「我們說鳴放，右派說大鳴大放，我們說鳴放是指學術上的，他們要用於政治。」^⑩他不僅將「涉及政治」

強加給「右派」，而且當上述引文後來被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時，更刪去了「鳴放是我們發明的」這句關鍵語^①，乾脆就否認了「鳴放」是他一手策動的結果。

三 黨內多數不贊成「鳴放」式整風

1956年2月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嚴厲批判斯大林，造成各共產黨國家反個人崇拜的大氣候，而毛澤東則竭力抵抗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。1956年4月間，他先後與蘇共主席團成員米高揚、蘇聯駐華大使談話時都說：斯大林「功大於過」，對斯大林「要具體分析」，「要有全面估價」。10月23日，他又接見蘇聯大使，明確表示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「有不同意見。還有若干問題，我們是不同意的」。到了11月30日，他再次接見蘇聯駐華大使，說：「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。」^②

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，劉少奇、鄧小平等借反個人崇拜的東風，強調集體領導，以「反對把個人突出，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」^③為名，在新黨章中刪去了「以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」中的「毛澤東思想」，在「黨員義務」那一款中的「學習毛澤東思想」也被刪除。

不久，毛對八大的不滿流露了出來。在12月的一次會議上，他裝出半打趣的樣子說：「大家擁護八大，不擁護我。」^④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說：「鄧(小平)曾在八大會議召開期間，叫毛休息，毛十分震怒。」^⑤毛對八大各項決議「大為震怒」，「1956年冬天起，毛在家精神抑鬱，整天躺在牀上，除大小便外，不起牀，甚至吃飯都在牀上。……他也是在利用這個時機思考下一步的行動。」李認為毛思考的結果是藉整風運動整一下黨內高級幹部(包括劉、鄧)及其推行的政策^⑥。

毛澤東搞「閉門整風」、策動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，很大程度上是唱獨腳戲。1957年3月8日，在康生、陸定一、周揚、文化部部長茅盾和作家巴金等文藝界人士的談話中，他說：「有很多高幹部，地委專員、地委書記以上……專員以上的幹部約一萬人，其中是否有一千人贊成『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』的都很難說，其餘十分之九都還是不贊成。這些都是高級幹部呢！」^⑦

《人民日報》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對毛澤東策動鳴放的異常做法也有所戒備，按副總編輯胡績偉的說法：「鄧拓可以稱得上是對『引蛇出洞』的『陰謀』有預見的人物之一。」^⑧由於中共中央對《人民日報》有規定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，毛澤東的講話未經公開發表不得引用。既然沒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，鄧拓便警告部屬「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」。在代表毛澤東領導《人民日報》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的支持下，鄧拓有理由對毛澤東的講話不作宣傳。毛澤東對此甚為憤怒。4月10日，他將總編輯鄧拓、副總編胡績偉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裏訓話。他躺在牀上，「像訓斥孫子似地」(胡績偉語)訓斥他們：「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。你們按兵不動，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。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報，不對，應當說是死人辦報。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，是抵觸、反對中央的方針，不贊成中央的方針。」他又罵鄧拓「佔着茅坑不拉屎」，「我看你

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鄧拓警告部屬「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」，他對毛澤東的講話不作宣傳。毛澤東對此甚為憤怒。4月10日，他將總編輯鄧拓、副總編胡績偉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裏訓話。他罵鄧拓「佔着茅坑不拉屎」，「我看你像漢元帝，優柔寡斷。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」。

像漢元帝，優柔寡斷。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」。同時，還斥責幾位副總編輯「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」^{①9}。

《人民日報》不得不馬上行動起來。負責記者工作的編輯李莊接到尖銳批評共產黨的稿件，暗自思忖：「誰敢登這種稿子？」他回憶當時的情景道：「請示總編輯鄧拓，他不敢作主，說請示以後再定。過了兩三天，正式告訴我：『登，登，一字不改都登。把記者都派出去，這一段就寫這種稿子。』黨報登這種稿子，沒有經歷過，我預感到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了。」^{②0}

4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，毛澤東再次責罵《人民日報》：「《人民日報》是甚麼人的報紙？要整一整。」「開了許多會議，不發消息。《人民日報》還是國民日報。」對黨內多數不熱心鼓動鳴放的局面，他十分不滿：「一定要放。怕放是道理沒有講通，或沒有說服。」「一家獨鳴了多少年，讓他亂一下子看看。」「我不是鼓勵人民鬧事，搞鬧事促進會。」早在2、3月間，毛澤東曾幾次批評陳其通等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的對推行「雙百」方針表示憂慮、疑惑的文章。而在杭州會議上，毛澤東說：「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，我就沒有群眾基礎。」^{②1}這明顯是氣話，而且是針對中央高層多數同志的。

4月，毛澤東再次責罵《人民日報》：「開了許多會議，不發消息。《人民日報》還是國民日報。」對黨內多數不熱心鼓動鳴放的局面，他十分不滿：「一家獨鳴了多少年，讓他亂一下子看看。」「我不是鼓勵人民鬧事，搞鬧事促進會。」

但毛澤東的話傳到下面就變了樣，「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」成了「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鳴放」。清華大學物理教員何玉騏在5月27日由校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主持的鳴放座談會上說：「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，你就是其中一個。」6月5日中共中央陸定一在報送毛澤東的《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》上說：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篇大字報，說中共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贊成鳴放。毛雖批說「完全造謠」^{②2}，但直到1958年初，他仍然耿耿於懷、怒氣未消，對去年他策動「鳴放」時不緊跟的人冷嘲熱諷：「1月省委書記會議，3月宣傳會議，還有頤年堂會議，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。不必憂慮，是可以解決的。可是打不動×××同志的心。我說十個幹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。他也不說反對，就是不執行。地委副書記以上一萬人，有一千擁護我就好了。北京的學校哪個（鳴放）放得開？」^{②3}

四 毛澤東發動鳴放運動的動機

另一方面，1956年發生波蘭、匈牙利事件，由於赫魯曉夫派坦克出兵匈牙利、處死納吉，挽救了匈牙利共產黨政權。毛澤東對這種危機有很高的警覺，他在1957年1月省市書記會議和4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講得很明白：

「去年下半年以來，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，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，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。」^{②4}

「小資產階級專政，把你搞下來他專政，想搞匈牙利的，要整一、二十年。各省要開群眾大會、演講會、辯論會，展開爭論，看誰勝利。小會他神氣大，大會他沒辦法。你要大民主，我就照你的辦。有屁讓它放，不放對我不利，放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。社會發生分化，我們爭取大家，大家認為臭，他就被孤立了。」^{②5}

「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，我們黨內大多數人是正常的、穩定的，少數人有波動。下雨之前總會有螞蟻出動。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。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（丁注：指赫氏鎮壓匈牙利人民暴動），螞蟻也縮回去了。」^⑳

「百家爭鳴有好處，讓那些牛頭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。」^㉑

「批評不過兩種，對的，補我們的短處，錯的，越錯越好，上台一講就揭露了。梁漱溟、彭一湖、黃炎培也叫過，以後又檢討。章乃器批評我們統戰部，放手讓他們批評，一批評反倒把他們孤立了。」^㉒

「不要怕鬧，鬧的越大越長越好。……全國大鬧不可能。哪裏有膿包，有細菌，總是要爆發的。大省五萬，中省三萬，小省一萬。準備鬧事，年終結賬。」^㉓

「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。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。……我們要放，要硬着頭皮，讓他們攻！攻一年。誰讓我們有教條主義，攻掉就好，攻得過火，就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。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，讓他們罵幾個月。……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，也有一些道理。」^㉔「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，不對（的批評）可以不聽，對的要接受。反對肅反、反對合作化的文章，可以駁一駁。這不叫誘敵深入，叫自投羅網。」^㉕

毛澤東在4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所說的「膿包」、「細菌」，就是後來的「右派份子」。「五萬」、「三萬」、「一萬」是他當時設想的各省的右派數目，後來各省所抓的右派數正與此估算不相上下。

由此可見，毛澤東發動鳴放是要黨外人士充當表決機器的民主花瓶，是服從命令聽指揮、該舉手時舉手的附庸，並不是真心要求他們的批評。不過，毛澤東是個好演員。一方面毛澤東在4月杭州會議上講了那麼多讓牛鬼蛇神表演的話，另一方面，4月11日他將北京大學馮友蘭、賀麟，上海復旦大學周谷城，中央民族學院費孝通等十來位名教授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時，又將對黨外人士的露骨蔑視藏得一絲不露，他說：「我感覺你們這些當教授的被搞苦了。……我們現在要整風。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，你們有甚麼意見盡管說出來，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。」^㉖可惜馮友蘭並不知道在毛澤東講話背後的含意。他參加鳴放，批評某些共產黨員「處處以救世者自居，自命為萬能的造物者」^㉗，結果成了一名北京大學黨委內部掌握的「內控右派」。

另一方面，毛澤東又說「百家爭鳴有好處，讓那些牛頭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。」^㉑「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。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。……我們要放，要硬着頭皮，讓他們攻！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，也有一些道理。」^㉔「這不叫誘敵深入，叫自投羅網。」^㉕

五 五月間全黨接受「引蛇出洞」術

從4月下旬開始，各種鳴放座談會在全國各地、各部門、各級機關同時舉行。但在5月15日，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鳴放時，毛就已經寫下給全黨高級幹部看的〈事情正在起變化〉。他在文中解釋道：「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甚麼允許登在報上？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、毒氣，以便除掉它、滅掉它。」他的策略是「誘敵深入聚而殲之」，其「誘」的對象是右派知識份子。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、百分之三、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……「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」^㉘。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稱〈事情正在起變化〉一文為「反右派的信號」^㉙。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說：「這篇文章，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」^㉚。

「反右派的信號」至遲是在5月18日發出的，各級黨委書記們才發現，原來毛澤東要整的不是他們，恰恰是那些「鳴放」者。他們一下子積極起來。「誰不參加鳴放，誰就是對黨不關心、不愛護，不愛社會主義……。」連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也是5月19日出現的。各單位的黨委書記們唯恐鳴放會對共產黨的批評不夠激烈，唯恐「秋後算帳」時材料不夠充足。

第二天，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名為〈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〉的黨內文件，要各級幹部繼續鼓勵鳴放。毛指示全黨對「帶有反共情緒的人」「暫時（幾個星期內）不要批駁，使右翼份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」^⑥。據薄一波回憶，「從5月中旬到6月初，中央接連發出指示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，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，就是讓右派進一步暴露……」^⑦。當然，這些「絕密文件」連「級別較低的黨員幹部都不知道」，一般老百姓當然更不知底細了。

其實這時鳴放還剛剛開始，「反共份子」尚未來得及「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」，連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也是四天後的5月19日出現的。章伯鈞的「政治設計院」、龍雲的「反蘇謬論」、羅隆基的「平反委員會」、林希翎的「中共封建社會主義」、清華大學學生要求開闢民主牆、儲安平的「黨天下」，乃至所謂葛佩琦的「殺共產黨人」的說法，這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「罪惡活動」，全是在毛澤東寫下「反右派的信號」後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，為中共反覆邀請而「放」出來的。

「反右派的信號」至遲是在5月18日發出的。那天晚上，主持《文藝學習》雜誌編務的黃秋耘到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。邵正鼓勵他「大膽地放」時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來了電話。聽了電話，邵「登時臉色蒼白，手腕發抖，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」，放下話筒對黃說道：「唔，轉了！」並囑咐道：「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，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！」^⑧當時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施平的回憶可以為此作注：「反右正式開始前，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……動員鳴放。有一天下午，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、北大、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……說：你們……要用各種辦法，製造適當氣氛，引蛇出洞，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……黨委書記要示弱……讓他們敢於盡情鳴放，無所顧忌。……時間不多了，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，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。」^⑨這裏，「反右正式開始前」指的是6月8日前，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、政治局委員彭真多次召開會議動員鳴放的舉動當不晚於5月下旬。是彭真心有靈犀、猜測揣摸出了風向？還是誰向他透露了毛的反右部署？

起先對「鳴放」消極應付的各級黨委書記們此時才發現，原來毛澤東要整的不是他們，恰恰是那些「鳴放」者。他們一下子放了心，也一下子積極起來。他們大會小會反覆引導、邀請甚至壓迫群眾參加鳴放。「誰不參加鳴放，誰就是對黨不關心、不愛護，不愛社會主義……」，這是當時各單位的黨委書記們用以壓迫群眾鳴放時最常用的詞語。他們唯恐鳴放會開得不夠熱烈、鳴放的內容不夠廣泛、對共產黨的批評不夠激烈、參加鳴放的人的「類別」不夠多樣性；也就是說，唯恐「秋後算帳」時材料不夠充足。

從這時起，全黨顯然都接受了「引蛇出洞」術。

六 為要「陽謀」不惜出爾反爾

反右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曾說：「反右派以後，『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』的方針，形式上沒有被廢除，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。毛澤東同志提

出，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，資產階級一家，無產階級一家……。」^{④①}

毛澤東在1957年4月間發動鳴放運動時曾說：「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，一個黨外辦，唱對台戲。」^{④②}4月30日毛將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請到天安門城樓開座談會時，又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，說：「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……確是不好當……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，不是形式上的，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。」「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。是否分成兩個組織，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，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。」「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，要改一下。（職權）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。」^{④③}

幾個月後，他的態度卻轉了一百八十度，說：「章伯鈞、羅隆基等……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，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。」^{④④}凡鳴放時對學校黨委制發了一點議論的人統統成了右派。毛澤東從未打算「改一下」學校黨委制，更未贊成過教授治校。毛澤東也從未真心認為「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」，而在鳴放中提請中共允許各黨派自己辦報、辦通訊社的人，或僅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的人，統統被打成了右派。

毫無疑問，毛澤東4月間說的全是假話。問題是毛澤東為甚麼說假話？若不是為了策動「鳴放」，毛澤東將保持一貫堅持黨委治校、一貫堅持報刊壟斷、一貫堅持新華社獨家新聞的記錄，絕不會在短短幾個月之間出爾反爾、言而無信。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次年，1958年4月毛澤東說的一段話可以為他的思想作一注解：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，大多數是中間份子，他們是剝削者……是個動搖的階級。……去年右派進攻，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，中國出了納吉，右派登台，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。打倒共產黨，他們都幹……。」^{④⑤}毛澤東還闡述了他的高明戰略：「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？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上台唱戲，在報紙上放屁，……然後……一鬥一捉。城裏捉，鄉裏鬥，好辦事。」^{④⑥}

甚麼是「陽謀」？這就是。

註釋

①②③④ 朱地：《1957：大轉彎之謎——整風反右實錄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、書海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76；引言：134；202。

④ 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（修訂）》，頁23。

⑤ 1956年4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，參見1968年清華大學刊印的《學習資料（1949-1956）》，頁275。本文多處引用文革中坊間流傳的、未曾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著作，以及他在黨內歷次會議上的講話、各種批示等。這些文件於文革初期從北京或地方各機關外流，或是北京幾所大學為主的紅衛兵抄被打倒的中共高幹家時的獵獲品。出於「宣傳毛澤東思想」的動機，他們大量印刷。有的叫《毛澤東文選》，有的叫《毛澤東思想萬歲》。這些未經發表的「毛澤東著作」，是研究毛澤東的重要材料。此外，將這些未公開發表的文件和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五卷相對照，可以看到第五卷中除了修飾、增刪文字外，有許多更是根據後來的政治需要而作的修改。

⑥⑦⑧ 1957年3月6日毛澤東在九省市宣傳、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，轉引自戴晴：《梁漱溟、王實味、儲安平》（南京：江蘇文藝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94；194；197。

- ⑨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，《學習資料(續一)》，頁63。
- ⑩ 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，《學習資料(續一)》，頁93。
- ⑪⑬ 《毛澤東選集》，第五卷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7)，頁485；424、428。
- ⑫ 北京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河北北京師範學院、中國歷史博物館聯合編寫：《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(1921-1967)》(北京：《史學革命》編輯部，1968)，頁148、152。
- ⑬ 1956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提交的〈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〉，參見《鄧小平文選(1938-1965)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9)，頁223。
- ⑭ 《中共黨史研究》，1988年第5期，頁36。
- ⑮⑯ 李志綏：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》(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，1994)，頁195；185、186。
- ⑰ 1958年3月8日毛澤東和文藝界的談話，引自筆者保存的1967年7月由某機關刊印的《毛澤東思想萬歲》，頁42。
- ⑱⑲ 胡績偉：〈報紙生涯五十年〉，美洲《世界日報》，1993年9月30日。
- ⑳ 李莊：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》(北京：人民日報出版社，1993)，頁206。
- ㉑㉒㉓ 1957年4月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，《學習資料(續一)》，頁44-46；42-43；47。
- ㉔㉕ 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，第6冊(北京：中央文獻出版社，1992)，頁403；478。
- ㉖ 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，《學習資料(續一)》，頁84。「鳴放」二字為本文作者所加。
- ㉗㉘㉙㉚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(彙集)，《學習資料(1957-1961)》，頁7；9；13；9。
- ㉛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，同上書，頁3。此文被收進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五卷時，改成了「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，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。……現在情況起了變化，他們不吭聲了。」見註⑩書，頁334。
- ㉜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，《學習資料》，頁22。這段話被收進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五卷時改成了：「至於梁漱溟、彭一湖、章乃器那一類人，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，放出來有利，讓大家聞一聞，是香的還是臭的，經過討論，爭取多數，使他們孤立起來。」見註⑩書，頁355。
- ㉝ 《人物》(北京)，1987年第5期，頁91。
- ㉞ 原載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，1957年12月25日，現轉引自陳一葦：〈馮友蘭的道路〉，《探索》，1991年第1期。
- ㉟㊱ 薄一波：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》，下卷(北京：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，1991)，頁589；610-14。
- ㊲ 李維漢：《回憶與研究》，下冊(北京：中共黨資料出版社，1986)，頁835。
- ㊳ 原載黃秋耘：《風雨年華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8)，現轉引自葉永烈：《反右派始末》(青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95)，頁175-76。
- ㊴ 《人民日報》，1986年5月9日。
- ㊵ 《學習資料(1957-1961)》，頁47。
- ㊶ 1958年1月28、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，《學習資料(1957-1961)》，頁138。
- ㊷㊸ 1958年4月6日中共中央漢口會議上的講話，《學習資料(續一)》，頁111；115。

丁 抒 江蘇東台縣人，1944年生於四川小城合川。1962年入北京清華大學。1979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，翌年赴美。1986年起以授課為業，業餘研究中國當代史。著有《陽謀》、《人禍》等。